

徐特立

教育思

想讲座



曹国智
孟相砥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

曹 国 智 主 编
孟 湘 砥

湖南教育出版社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

曹国智 主编
孟湘砥

责任编辑：江 源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6 印数：1——18,500

统一书号：7284·232 定价：0.46元

前 言

徐特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品德高洁。他在教育理论上，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但也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学贯中西，有很多卓越的见解，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它们在过去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上，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为了学习、继承和发展徐特立同志的教育思想，开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湖南省教育厅决定从一九八三年秋季开始，在我省高等师范院校、中等师范学校，省教育学院，市、地、县的教师进修学院（校）的教育学教学中，增加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内容，为此，委托省教科所组织人员编写《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供教师、学生使用，并供教育行政干部及中小学校长、教师参考。

本书引述原文较多，其目的是为了教者和读者能够从中较多地阅读到徐特立的原著，以便直接领会这位革命老前辈的睿智的教育见解和朴实的文风。但为了使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脉络清晰连贯，我们在起承转合之处作了少量阐述，在需要联系实际的地方仅略作点拨。由于此书引文多来自一九八〇年湖南人

民出版社的《徐特立文集》，凡出自此书者，仅注明页次。

此书由九位同志编写，一人写一讲。每讲独立成章，各章互相联系。按讲次顺序，这九位执笔人是：长沙师范陈志明，省教科所孟湘砥、许超荣，湖南师院雷晋虞、杨布生，常德师范徐厚道，湖南师院赵士启，湖南第一师范张义文，省教科所曹国智。编写的大体过程是：在共同讨论确定讲题和提纲的基础上，分头执笔，然后召开审稿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全书最后由曹国智、孟湘砥审阅，作了适当修订，并在体例和文风上作了一些统一。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准备在此书使用一段时间后，听取各方意见，再作修改。

编 者

1983年4月

目 录

第一讲	徐特立的生平和教育实践·····	(1)
第二讲	徐特立的教育哲学思想·····	(27)
第三讲	徐特立的办学思想·····	(49)
第四讲	徐特立论教育目的·····	(70)
第五讲	徐特立论道德和道德教育·····	(90)
第六讲	徐特立论教学工作·····	(111)
第七讲	徐特立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34)
第八讲	徐特立论教师·····	(155)
第九讲	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特点、 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173)

第一讲 徐特立的生平和教育实践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湖南省长沙县人，生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逝世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九十一岁。徐特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他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徐特立同志在多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艰苦复杂环境中，从事教育工作，时间长达七十余年。他积有丰富的经验，有很高的理论修养，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下面分湖南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四个时期，概要介绍徐特立的生平和教育实践。

一、湖南时期

1. 青少年时代

徐特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祖父务农兼行中医，父亲徐树兆务农、烧窑兼从事短途搬运。徐特立四岁丧母，家境愈趋清苦。他九岁始入蒙馆，先生的严厉使他常存恐惧，“四书五经”引不起读书的兴趣。但他读朱伯庐的《治家格言》，觉得道理既易懂又适用；读杨椒山的《遗囑》，竟悲痛落泪。十五岁时，老师是个和尚，除教他读八股文外，还教他读禅宗语录，这使他同

时受到封建的教育和佛教的熏陶，从而懂得一些唯心派的哲学。十二岁出继给病瘫的叔祖母为孙，十六岁时叔祖母谢世，因丧负债而辍学，他只好在家一边耕作，一边自学。先是读祖父遗留的医药书籍，拟以行医为职业。由于中国的医学理论与卜卦、算命和堪舆，同是以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加以抽象化的理论为基础，于是他成了医生和阴阳家，同时又是佛家。到二十岁的时候，他放弃行医和迷信职业，改习科举，学写八股时文。不久，结识了一位叫陈云峰的老举人。陈老先生批评他“为什么不读书，好读八股”？并告诉他“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的道理，引导他研究汉学。他这样从十六岁到十九岁中，虽“乱撞一顿，毫无成就”，但也养成了“过复杂生活的习惯，破坏了固定不变的思想”（597页）。

徐特立从十八岁开始在乡村教蒙馆，一直教了十年。他边教边学，也自学了十年。那时，在既难找到可以问疑质难的先生，也难找到可以相互磋磨的朋友的落后乡村，青年徐特立走自学的道路并非易事。他学习经、史、子、集，遇到的一切疑难，都靠自己查考资料，苦思冥想，才能求得解决。自学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困难更多。但最大的困难，还是找不到必需读的书籍。他教书所得俸金极少，第一年仅得三串钱，合大洋不到四元，而买一部《十三经注疏》却需要十五串。买书不易，借书也难。偶然借到一部好书，就废寝忘食地抄读一遍。学问越长进，就越难找到有价值的书读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订出了“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即将祖母遗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用以买书来读。书籍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读

书的时间。他很赞赏《三国志·王肃传》注中“学足三余”的办法，即抓住一切闲余的时间读书。他甚至连走路的时候都看书。他晚年回忆当年边教边学的情景时说：“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551页）

青年时代的徐特立，其人生观既受儒家、法家、墨家的影响，也受佛家的影响。他主张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前者学佛家，后者学法家。他对孔子的“仁”、“恕”，对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都是赞赏的。要而言之，青年时代的徐特立，其思想是处在杂乱的时期。（596页—600页）

2. 辛亥革命前后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城乡经济日益凋敝。徐特立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深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忧心忡忡，他矢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崇拜康、梁，拥护“戊戌变法”。但“百日维新”失败了，后来康梁又堕落成保皇党，这使他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刺激”，认识到在中国不可能有改良主义的道路。一九〇五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宣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旧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也就转而信仰孙中山。这一年他二十八岁，考入同盟会会员周震麟先生在长沙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四个月以后，即和姜济寰、何雨农等同学一起，到长沙县农村创办了梨江高小，开始从事新式的学校教育。他当时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他认识到提高农

民的文化知识，对于改变愚昧落后状况，振兴中华，至关重要。在他们举办的梨江高小里，主要招收农民子弟读书。他为了给农民尽义务，提出多教课，只吃饭，不要工资的主张。

一九〇六年，他进城协助进步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创办周南女学，发展女子教育。他为了解决穷苦人民不能受教育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周南女校任教的同时，组织发动一批教师，在长沙城北门外的李大中丞祠堂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二百多名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工人和店员。这是湖南长沙最早兴办的平民夜校。后来，他在长沙修业学校教书时，也办过这样的平民夜校。

这一时期，是徐特立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因为有机会读到《民报》、《猛回头》、《浙江潮》和《新湖南潮》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他的民主革命的思想意识更强烈了。他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宣传民族革命的意义。在“反对割闽换辽”、“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中，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印发传单，组织发动了长沙学校早期的罢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南长沙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一九〇九年，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作时事讲话，以湖南辰州教案和江西南昌教案为例，历述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他声泪俱下，激昂、悲愤至极，竟断指血书，以激发青年起来爱国和反对帝国主义。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徐特立是湖南最先的响应者之一。他往来长沙城内外，向民众宣传武昌起义的意义，并组织教育界人士和各界相配合，推动湖南新军起义。胜利后，他因功被

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但湖南新生的军政府成立不到十天，革命的果实就被封建官僚势力的代表谭延闿等人阴谋篡夺了。徐特立愤懑之余，决然辞掉副议长职务，仍回教育界任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校长，潜心办学，希望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革人心，以出现好人政府。这便是他长期奉行教育救国主张的思想基础。

一九一二年，徐特立为了普及长沙城乡的小学教育，和长沙县知事姜济寰商议，拟创办一千所小学校，并首先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培养迫切需要的小学教师。当时办师范学校既无房屋，又无经费，但他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借善化学宫的破旧房子作临时校舍，一举招收了六个班学生（五年毕业的本科、一年毕业的一部讲习科、半年毕业的二部讲习科各两班）。田汉、周竹安、陈子展等，都是这一届的学生。以后他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经营，才在长沙荷花池泐潭寺建成永久校址。

这时，袁世凯的爪牙汤芑铭督湘，认为学校是制造革命党的机关，停发教育经费。长沙师范濒临断炊停课，他不忍坐视几百个青年失学，断然决定将学生带到李公庙、城隍庙去上课，将原有校舍出租，以每月四百元的房租收入弥补经费之不足。在创办长沙师范的过程中，他不仅倾注了全部心血，而且个人还因此亏欠了六百多元的债款。

一九一三年，他一方面为了解决家乡长沙县五美乡农民子弟的入学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进行农村小学教育的实验，他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办成长沙县私立五美高级小学校，并自费置校具、聘教师。他还有意将五美高小与长沙师范学校联系起

来，把许多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直接输送到长沙师范。这些学生毕业后也都成了优秀的革命人才。

他除了创办小学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之外，还十分关心幼儿教育。他是湖南孤儿院的创始人之一，并一度担任院长，至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才辞掉这一职务。

3. “五四”时期

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的十年间，徐特立与黑暗势力作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一九一三年，公开揭露汤芑铭大搞封建专制主义，摧残教育事业，迫使学校停办的罪行；一九一五年，坚决反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无耻卖国的罪行；无情揭露湖南教育界的败类及反动政客鼓吹帝制的丑恶嘴脸；声讨南北军阀抢夺湖南地盘、残害湘人的罪行。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徐特立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及修身等科的教员，其间还兼任过实习主任。当时的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萧三、李维汉、罗学瓚、陈昌、张昆弟、郭亮等。他们深受过他的影响。此外，他还继续在省立第一女师和周南女校兼课。向警予、缪伯英、蔡畅、丁玲等，也是他在这两校的学生。他还一度被湖南高等师范学堂聘为教师。著名教育学家舒新城就是他任教高师时的学生。由于他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因而在学生中威望颇高。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对学生影响最大的还要算他的艰苦创业精神。当时，

徐特立作为长沙师范校长、第一师范的实习主任和湖南孤儿院院长，又是各校争聘的名教员，却总是布衣布鞋，从不坐轿。他从荷花池的长沙师范到南门外的第一师范去上课，往返十余里，不论晴雨，总是步行，多年如一日。他教《修身》课，常以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嘉言懿行为例，结合自己身体力行的体会，来教育学生，使学生有所借鉴和仿效。在对学业上，他的指导也是十分得当的。比如，他针对当时一师学生读书贪多图快的毛病，便及时地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博览与精读相结合”的主张。

徐特立最初来长沙各中学任教时，本来是一位能胜任数理化各科教学的科学教员。但他看到当时中小学教学质量不高，就于一九一〇年自费到江苏的南京、上海考察小学教育，旋又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后，他任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兼附属小学校长，进行教育上的改革，并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之一《周南教育》，用以指导小学教育的改革，他也同时由科学教员转变为教育科学教员。到五四时期，他已是湖南教育界颇著声名的各科教学法的研究专家。他精心编写了《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等讲义，以丰富的内容、新颖的见解，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这些讲义在当时都未刻出版，现今保存着的还有《各科教学法》上册。

徐特立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热情。他与何叔衡，陈凤荒、朱剑凡等人发起成立“健学会”，在教育界和新闻界展开对革命新思潮的研究和传

播工作。他还不惜个人安危，联合发动陈凤荒、张敏、易培基和朱剑凡等有社会地位的校长，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并往返城乡，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残民的劣迹，积极参加湖南人民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不仅大力提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且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不顾自己已经四十三岁，情愿远涉重洋去法国做一名勤工俭学学生。他到了法国，先在五金工厂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并在木兰公学补习法文。一年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

“五四”运动给徐特立思想上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自己作了这样的叙述：“那时候，国家混乱，令人悲观失望，我的精神忽然死了，到‘五四’时我才又复活过来。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国家的前途必然黯淡，我个人也就是一个早衰的可怜虫了。”（603—604页）

4.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跃进为共产主义者

徐特立初到法国，对于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颇为推崇，这当然是由于他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痛恨，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有感而发的。但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特别是经过中法反动当局勾结起来迫害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事实的教育，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之手，大多数入不得温饱，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建筑在金钱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同样充满了不平”。从而，他这个“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初步懂得了“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劳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的

道理，终于站到穷苦学生一边而反对中法两国的反动派。他曾和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一起从巴黎赶到里昂营救因进驻里昂大学而被法国当局囚禁的勤工俭学学生。在共同的斗争中，他除了和他从前的学生蔡和森、李维汉、肖子章、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之外，又广泛地结识了周恩来、陈毅、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李卓然等同志。他同时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尽管他当时还在信仰无政府主义，但这些人 and 事，对于他后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徐特立 在法国一方面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注意了解西欧的教育。他用近一年的时间，自费考察了法、比、德三国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教育，这对于他后来的教育活动亦有较大的裨益。

一九二四年夏天，他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祖国。但在昏天黑地的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竟以冷淡、轻侮和弃置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满怀热望要为国投效力量、改造落后面貌的老留学生。

徐特立不向腐朽势力屈服，爱人民、爱教育事业的热心，又驱使他重走私人办学的道路。他没有经费，便用借贷和开会的方式筹措经费；没有房子，便借用长沙师范的一栋杂屋；没有课桌椅，便到一师、周南、省立一女师请求捐献旧桌椅；没有教师，便邀集朋友、老学生尽义务教课，只用两个多月时间，居然办起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中除一个厨工外，别无勤务人员，一切物质条件都很差。他一身兼任校长、教员和校工，每日除了上课，还要摇铃、扫地。

徐特立正在筹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适有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曾致函聘请他为广东大学教授，但他决心留在长沙，为发展湘省的中小学师范教育尽力，而婉谢了聘约。他为了广泛宣传在西欧考察教育的所得，以便省内外教育界借鉴，又利用暑期，多次举行讲演会，介绍法国小学教育状况和欧洲义务教育现状，并整理成文在报刊发表，这对于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

徐特立以渊博学识和办学的丰富经验，赢得了教育界及社会各界信誉。自一九二五年春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一身兼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县立长沙师范和私立长沙女子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他把过去自己办学治校的经验，同考察西方学校管理制度所得，融会贯通起来，在三所学校实行种种改革，其荦荦大者如下：

倡导民主治校，废除校长处理一切的制度。在公立的长沙师范组织“校务会议”，由校内师生代表参加，举凡校内事务，皆由校务会议研究决定，然后由校长公布实行。在私立的长沙女子师范组织校董会。校董会的五名常委轮流处理学校日常事务，只有重大事项，才需请示校长。

打破封建校规，鼓励学生特别是鼓励女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课余休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选聘教师的标准是思想作风正派，学有专长，且教学负责，堪为师表。

反对在校内搞派别，拉小圈子的不良风气。

提倡尊师爱生，主张尊重学生人格，实行说服和诱导，“诗

教”则是这种教育的集中体现*。

在他的这种民主进步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三校的面貌为之一新，特别是被他聘用和器重的教师中有周以栗、陈章甫、罗学瓚、周竹安、廖锡瑞、曹典琦等共产党员，还有熊瑾玠、周世钊、黄芝冈等进步教师。当时，正值大革命期间，三校中的学生在他和上述革命教师的教育与影响之下，大多积极投身于革命，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许光达、廖沫沙、赵自选、曾宪植、刘英、朱端绶等。

正是在当时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徐特立本人也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一九二四年从欧洲回国时，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仍然奉行教育救国论；在政治上则是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七年春，他回到故乡考察农民运动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的革命渺乎小矣！”（604页）他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自己为之奋斗三十年的教育救国是一种幻想。于是，他放弃教育救国论，走出学校，担任省农民运动协会的教育科长，兼任农村师范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农部部长，全力以赴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大革命失败了，反动派疯狂捕杀革命党人，一些动摇分子纷纷脱党，甚至有一些投降了敌人。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徐特立却看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

* 参看周世钊《我们的师表》，熊瑾玠《革命老人徐特立》。